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丁 玲

DING LI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丁玲代表作

焦尚志 刘春生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丁玲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1.125印张255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400-0091-0/I·85 定价5.15元



作 者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丁玲是我国现代著名革命作家。在她漫长而坎坷的一生中，搏击在革命的中流，吞吐着时代的云雾，写下了大量激荡人心、独具风采的小说和散文，在中外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一九〇四年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她幼年丧父。母亲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弃家务而从学，后成为一个小学校长。她的民主革命思想，对丁玲有过积极而深刻的启迪。丁玲在桃源女师读书时，澎湃激荡的“五四”革命浪潮，唤起了她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她产生了追求真理的思想萌芽。不久，她就读于长沙周南女中，在进步教师的启发下，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陶冶了她浓厚的文学兴趣。一九二一年，丁玲到了上海，进入由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后又转入曾经培养过不少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学学习。这对丁玲曾发生过深远影响。但在当时，由于她年少幼稚，对革命并未真正理解；而十里洋场，封建主义加半殖民地上海的种种黑暗现象，却使她深深感到失望。一九二三年丁玲来到北京，一九二四年结识了胡也频，从此他们结成了伴侣，相依为命，在人生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在此前后，丁玲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强烈不满，但又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处

于极为彷徨、苦闷之中。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才惊醒过来。她试图冲破个人的狭小的生活圈子，南下投身革命，重赴上海。但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的白色恐怖下，她已很难找到早先从事革命的朋友了。于是她又回到了北京，在无路可走的极端的精神苦闷中，开始了小说创作，抒发郁积在她心底的愤懑与不平。

一九二七年末，丁玲第一篇小说《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之后，又陆续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短篇。从此，丁玲的名字像一颗灿烂的明星闪耀在中国文坛上。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参加“左联”之前，丁玲先后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等三个短篇小说集。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五四”以来新女性要求解放的精神，大胆地描写了她们的精神苦闷和由此而来的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但同时也流露出较浓的感伤、低沉情绪。《莎菲女士的日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是一篇日记体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记述了一个深受“五四”思潮激荡的知识分子少女，对社会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与绝望。作者以泼辣、浓烈的笔触，描写了她那种倍受压抑的叛逆性格与畸形心态。莎菲身患肺病，只身走上社会，寻求幸福与自由。她蔑视一切习俗，敢于向旧礼教宣战；她要求个性解放，向往热烈而痛快的生活。但在令人窒息黑暗现实中，却处处碰壁，大失所望。苇弟深挚地爱着她，而她却讨厌他那懦弱、呆板的性格，以至每每戏弄、嘲笑他。莎菲又曾经为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中的凌吉士那特有的男性“丰仪”所倾倒，向他主动进攻，并决心“占有他”；而当她发现凌吉士在“高贵的美型”下掩盖着的却是一颗“卑劣的灵魂”时，几经情感与理智的激烈搏斗，终于诀别了他，莎菲因而陷入

了更深刻的苦闷与绝望之中。她“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莎菲追求个性解放是失败了，但她那种大胆冲决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却激起了当时青年男女的强烈共鸣。正如茅盾曾经指出的：“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因而，莎菲的形象尽管与当时革命青年尚有距离，但她却是时代的、社会的一种典型，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由于作家当时的生活和思想的局限，无法替主人公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与办法，不免给作品染上了感伤、灰暗以至颓丧的色彩与情调。此外，大胆而又细腻的心理剖析，不以曲折情节取胜，而以变幻莫测的内心矛盾的流动夺人的结构方式，显露出了作家的艺术才华与初步形成的创作个性。

可见，丁玲一开始创作，就显示出积极的创作倾向，这就是：反封建，求解放，争自由。随着时代的前进以及作家世界观的逐步革命化，越是到后来，其积极、进步的创作倾向就越是鲜明与突出。

一九二八年，丁玲与胡也频迁居上海，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她一九三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在工农群众运动的激浪中，在瞿秋白、胡也频等共产党人的启迪下，丁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早先的旧社会激烈而盲目的反抗者，转变为一个具有初步觉悟的革命者。与此同时，她的创作也具有了鲜明的革命倾向。这一时期，丁玲连续发表了多篇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较早创作的长篇《韦护》（1930年）和中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

一、之二)》(1931年),虽然描写的是当时颇为流行的“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的主题,但作者并没有使主人公陷于“革命与爱情”不能自拔的悲剧冲突中,而是热情赞扬主人公跳出狭窄的个人生活圈子献身革命的可贵精神。不过,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题材范围,感伤情绪仍时时流露出来。

稍后至三十年代前半期,丁玲的创作题材逐步扩大,革命倾向更加鲜明。在此期间出版的《水》(1931年)、《夜会》(1933年)等短篇小说集,已经突破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开始注意反映工农群众及其革命者的生活和斗争。如描写农村革命的《田家冲》(1932年),工人家属觉醒的《消息》(1932年),革命者壮烈牺牲的《某夜》(1933年),以及破产农民流落城市的遭遇的《奔》(1933年)等,都反映了城乡社会生活的激烈动荡和工农群众奋起反抗剥削者与压迫者的革命精神。中篇小说《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品以一九三一年中国南方十六省的水灾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觉醒。在严重的水灾面前,千百年来遭受地主盘剥、压榨的农民,看透了剥削阶级的反动面目,认识到人们苦难的根源,增强了对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仇恨。事实使他们认清,盼官府募捐筹款,等菩萨萌发慈悲,都只是梦想,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救。于是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呼啸着奔向城市,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表现了愤怒的农民起来反抗的浩大气势与雄伟力量。如果作家不了解农村的阶级斗争,没看到农民的力量及其出路,作品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的。何丹仁(冯雪峰)就曾指出:“《水》的最高价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其次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地方”。(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

《水》》)。《水》这部小说的另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主人公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遭受水灾的农民；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融为一体的群众集体。《水》在题材、主题和形象上的创新，不只在丁玲个人的创作道路上，而且在当时的左联文学以至整个新文学的创作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已被清算，标志左联文学以至整个新文学创作已经冲破狭小的题材圈子，进入工农大众斗争生活的广阔天地。但作家对农村斗争生活毕竟还是不太熟悉，因而缺乏具有鲜明个性与深刻概括力的农民典型形象，在反映革命时代的深度与力度上，尚有一定差距。

一九三六年九月，经党组织的营救，丁玲逃出南京，秘密返回上海。几年的铁窗生活的考验，不仅没有减损她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她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决心。不久，丁玲冒着生命的危险，离沪潜赴西安，一九三六年底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真正飞到了一个广阔、自由的新天地。在这块充满阳光和热力的红色土地上，丁玲和解放区的群众共同生活和战斗了八、九年之久。她曾担任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领导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又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陕北这段不平凡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实践中，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延安整风运动，则是其变化的重要分界线。

丁玲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怀着满腔热情深入工农兵和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注意观察新生活和熟悉新人。在一九四二年之前，先后写出了《彭德怀速写》（1937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37年）、《冀村之夜》、《压碎的心》（1938年）、《新的信念》（1939年）、

《县长家庭》（1940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夜》等一系列优秀小说、速写和报告，表现了根据地人民的新的精神面貌和高涨的抗日热情。同丁玲早期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水》等篇什相比较，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个显著的进步，即：作家善于从人物的意识深层去揭示时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深入现实人物的意识领域，这是社会解剖与艺术塑像的重要途径。作家原本是一开始就富于这种诗的天才的，随着作家思想的前进和对新生活的深入体验与理解，这种特性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我在霞村的时候》，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塑造了一个虽然深受日军的摧残、蹂躏而灵魂却纯洁清白的农村少女形象。十八岁的贞贞身陷虎口，曾利用军妓的身份，多次忍受巨大痛苦，艰难完成党交给她的情报工作。回乡以后，不愿以自己的有病之身，给别人带来不幸，拒绝解决婚姻问题，并毅然离开亲人，奔赴延安学习。作家在这里所探究的原是一个平凡而有少许特征的“灵魂”，但在非常的遭遇下，却展示了它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噉噉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冯雪峰：《从〈梦珂〉到〈夜〉》）。《夜》所表现的则是新旧交替时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中新与旧的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乡指导员何华明，思想上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应该自觉作好社会工作，但又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家中“荒着的田地”和将要产仔的“唯一的牛”；他嫌弃比他大十几岁的落后的妻子，甚至想同她离婚，但却又顾虑“影响不好”，竭力压抑着内心深处的苦恼，最后思绪又逐渐回复到“如何能把农村弄好”的工作上来……。作者抓住何华明在会后回家的路上和到家后一段触景生情的心理活动，把新旧交替时代人们在前进中所产生的复杂思想矛

盾，质朴而完美地揭示出来，使人们感受到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破土而出了。作家就是这样，透过对人物隐秘的灵魂深处的探索与发掘去认识根据地的新世界及其产生的深刻变革。

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丁玲在热情地讴歌根据地的深刻变革和人民新的精神风貌的同时，还真实描写并揭示了根据地及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这方面的作品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1941年）、《三八节有感》（1942年）等。《我在霞村的时候》，主要是称颂少女贞贞忍辱负重、坚持抗日、不忘进取的朴素而伟大的灵魂，但同时也批评了那些用世俗眼光看待贞贞的不幸遭遇，给她增加巨大精神痛苦的周围群众的愚昧和落后。《在医院中》，通过对主人公陆萍在根据地医院的生活描写，批评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特别是揭露了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小生产势力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尖锐矛盾，指出这种思想作风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危害；并从主人公奋斗的失败中，进一步表现了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作品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问题，显示了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思想深度。至于作者笔下的陆萍，尽管她还有缺乏锻炼、感情脆弱等缺点，但从主导倾向上看，她却是一个具有可贵的工作热情、蓬勃的革命朝气和现代科学知识的革命青年，而绝非像有些文章所论定的是什么“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三八节有感》是篇杂文，作者从关心妇女社会地位出发，就恋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思想障碍，提出妇女“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的建议，即要有健康的身体，进取的思想，思索的头脑，奋斗的决心，并强调这种抱负“只

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这篇杂文反映了当时延安妇女中某些真实情况，提出了一些令人思索的问题，同样是有积极意义的。不难看出，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是怀着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从生活出发，提出问题，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的。就其体现出来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观点来说，也还是进步的。当然，这些作品也还有某些缺点和问题。如《我在霞村的时候》，未能写出贞贞和群众对凶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在医院中》，对革命队伍内部抵制、反对小生产者的思想与作风的无产阶级力量，表现得过于单薄和无力；《三八节有感》，则又把处于延安这个红色都城的革命妇女的社会环境描绘得太灰暗了。归根结底，作家对革命根据地这个崭新世界还缺乏全面认识与本质的把握，对生活、战斗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内蕴藏的伟大力量，尚缺乏深刻的体验。因而，反映在上述作品中，在揭露和批评根据地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时，又往往给人以沉闷、压抑之感。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主导倾向是积极的、进取的，其中反映出来的某些问题，至今仍是发人深思的。

一九四二年，丁玲参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伟大的整风运动，使她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震动。在此期间，丁玲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武器，认真检讨了自己的思想与创作，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的目标和方向。从此，她下工厂，到农村，去部队，更加自觉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努力把握根据地现实生活的革命本质与蓬勃向上的时代脉搏。认识提高了，生活深入了，视野开阔了，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和工农兵群众中许多感人的先进事迹，纷纷涌向她的笔端。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丁玲以热情充沛、洒脱清新的笔触先后写出《十八个》、

《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三日杂记》等报告文学和特写。这些作品质朴、真实地记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工农兵群众紧张、火热、昂扬奋发的新生活和新的精神风貌，倾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的挚爱之情。不少人物特写，作家发扬她善于探究人物意识领域的特长，侧重表现先进人物热爱边区、热爱新生活，公而忘私，赤诚地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经历与思想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党的政策在改造世界与变革现实上的巨大威力。《田保霖》就是其中的优秀篇章。田保霖是当时陕甘宁边区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著名劳动模范。他原是个买卖人，又曾在教堂作过事。边区政权建立后，他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他体会到共产党对他的好处，但又不想把自己与共产党连结在一起。在当了县参议员、参加人民政权的工作后，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识了共产党，“他们活着不为别的，就只盘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树立了“替老百姓办好事”的思想，从而把自己的前途与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作家通过对田保霖由一个本分保守的买卖人逐步走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的质朴、简洁的记叙，层层深入地揭示了他思想变化的过程，显示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伟大感召力量。《田保霖》这篇报告文学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指出这篇作品是作家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为她坚持“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丁玲这一时期的特写和报告文学，大都收在《陕北风光》这部集子中。在该集的《校后记所感》中，作家深有感触地写道：陕北这个名称在我生活中已经成为过去了，但陕北在我历史上却占有很大的意义！“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

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这一时期，“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了，而是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的确，陕北这段生活经历，是作家思想和创作的重大转折；从这里出发，丁玲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更加自觉地投入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坚定了为工农兵的创作方向和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丁玲参加了华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亲身经历和体验了广大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的深刻变革。在此基础上，一九四八年四月，写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九月东北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既是丁玲十余年根据地生活、特别是实践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重大收获，更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块丰碑，曾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以伟大的土改运动为题材的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一九四六年华北农村（来水县）的土改斗争。它以暖水屯为背景，从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到分地、参军，表现了土改斗争的全过程。作品围绕这场土改运动，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解放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觉悟的艰难过程和伟大革命精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确、深刻地表现了解放区的土改斗争和农村的巨大变革，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首先，作者从生活出发，真实地描写了农村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情

势与面貌。作品中地主和农民之间，既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又往往纠缠着种种宗族亲朋瓜葛。如富裕中农顾涌，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外村的富农胡泰和本村地主钱文贵的儿子。钱文贵既与顾涌联姻，又把他的女儿嫁给了贫农出身的村治安员张正典，他的侄女黑妮又同雇农、村农会主任程仁有着较深的爱情关系，而他的胞弟钱文虎则又是贫农、村工会主任。贫农侯忠全是地主侯殿魁的堂侄，同时又是被后者残酷剥削与压榨的佃户……。总之，在地主与中农、贫雇农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一种错综交织、纷繁撩乱的复杂关系，极易造成农民阶级界限的模糊与混乱。在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情势下，作品展现出来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钱文贵，却又是那样一个阴险狡诈、老谋深算的恶霸地主。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在于，表面上看来，他并不是穷凶极恶、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既不像孟家沟恶霸陈武那样坑人害命，杀害过八路军的罪恶昭彰者；也不如白槐庄地主李功德那样拥有几百顷土地，他只有七十余亩地）；但他却是压在全村人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全村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被暗算过，没有一个人不是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巧于伪装，懂得对付共产党的策略。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就要掌权了，便装得开明、进步起来，不仅有意同贫雇农及村干部联姻，还把土地表面上分给两个儿子，并把二儿子送到八路军中去。土改工作组进村后，迟迟确定不了斗争对象，不敢把钱文贵的名字提出来，是同他的阴险狡诈有直接关系的。而农民群众，特别是干部中颇为普遍的“变天思想”、自私自利和宿命观念等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与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意识，则又是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复杂性的具体体现，更是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严重思想障碍。作家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